

族群關係的香港範式

李國園

香港的族群關係是一種共生關係。在這種體系之下，族群間也就較和諧而有合作性。但是它得依靠一項重要的環境因素，那就是不需要為政治權力的分配而爭執。香港的族群關係可以作為兩岸示範的例子。

本年4月22日，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李國章教授在「社會科學的應用與中國現代化研討會」的開幕致詞中說，香港多年來因舉辦一連串有關中國文化與現代化的研討會，已在中國人的知識界裏形成一座橋梁，向西伸張到中國大陸，向東伸張到台灣，有效地溝通了兩岸三地的學者。李校長所說的情形雖然發生在香港回歸之前，但我們希望香港在今年7月1日回歸以後，仍繼續扮演這樣的橋梁角色，不僅產生溝通聯繫的意義，而且在某一較深度的層次上，扮演若干示範的意義。

前此香港雖在英國的殖民統治之下，但無可否認的是，香港無論在經濟發展、企業管理、城市建設、交通管理以至於民眾遵守法律的程度等等方面都可以提供兩岸作為示範的例子，而且也可以在其他更觀念性的層次上形成今後兩岸發展的範式。譬如說，在族群與族群之間的關係上、兩岸內部以至兩岸關係上，都出現有相當緊張、不安的現象，但在香港，族群關係卻是一點都不成為問題，這就可以作為示範的例子。也許有人要說，香港是廣東人的天下，沒有其他族群存在，所以根本不形成族群問題。其實這種想法是不甚正確的。廣東人把所有非廣東籍的人都稱為「上海人」，這就是一種族群偏見，也就是有多種族群存在的徵候。實際上，香港區域內存在有許多不同方言群，除去真正的上海人外，潮州人、客家人、海南人、北角的閩南人以及於其他各省的移居者都不在少數，何況華人之外仍有歐洲人、印度人等等。當然，廣東人在其中佔絕對多數的強勢地位卻也是不爭的事實。存在一佔絕對多數的強勢族群，並不表示一定就沒有族群問題，世界上許多地區與國家，經常出現佔極少數的族群卻形成內部大問題的例子。然而在香港，族群的關係一向都是相當和諧的，至少沒有形成緊張的關係，更未發生甚麼大衝突。

香港的族群關係可以說是一種共生 (symbiosis) 的關係。這種共生關係的形成，主要是因為香港在過去百年間的政治權力是握在英國人手裏，華人的各族群以至其他外國人都無須為政治權力的分配而爭執，他們只有在英國人所訂的

「遊戲規則」下作經濟上的競爭，因此是一種既競爭又合作的相互關係，這也就是所謂共生的經濟關係。在這種共生的關係體系之下，族群間的關係也就較和諧而有合作性，至少沒有嚴重的具體或潛存的衝突，這也就是我說的可以作為兩岸族群關係示範的意義。但是這種關係卻依靠一項重要的環境因素，那就是不需要為政治權力的分配而爭執。在這裏，我自然不是指恢復殖民統治的體制，而是寄望更合理的政治體制的出現，從而使族群之間能像目前的香港一樣，可以不必為權力的分配而爭執，這樣才能促進族群間的和諧共生關係。我們可以用西藏地區的族群關係為例來進一步探討。

最近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一位年輕學者王明珂先生，因為研究青康藏少數民族問題有傑出貢獻而獲中央研究院李遠哲院長頒發「青年優秀著作獎」。今年3月23日正當達賴喇嘛訪問台北之時，他在台北《聯合報》發表了一篇很有長遠觀點論西藏族群關係的文章，題為〈藏獨：社會經濟與宗教文化挫折的反射〉。王先生在這篇文雖短但卻很具歷史與現實深度的論作中認為，西藏的獨立或維持現況都不是很單純的問題，他說：

在這些現實之下，獨立是否表示西藏可以在經濟上不依賴中國而存在？或與中國再展開另一個輪迴的資源爭奪戰？獨立是否造成優勢族群壟斷主要資源，並導致內部各族群間的血腥衝突？——更重要的是，經過多年的疏離、中共教育栽培下的新一代西藏知識份子與領導幹部，在意識形態上已與流亡在外那批政教精英有相當距離，二者之間如何調和，而社會主義理想與藏傳佛教間的矛盾如何解決消除？——其所反映的問題也不是達賴所領導的流亡政府回來便能解決的。

王先生所以對西藏獨立的問題提出這樣猶豫的看法，實際上是基於下面幾點歷史進程與現實情況的觀察：

(1) 兩千年的歷史發展，已使漢族壟斷東亞大陸的主要農業資源，所以青康藏等地的族群已極難獨立於中國之外，只能在劫掠中國、依賴中國貿易或接受中國補助、「賞賜」間做選擇。

(2) 在近代之前，從未出現一個統一的青康藏高原國家或民族認同。而在資源至為匱乏的環境下，只要與中國無戰事，當地族群便陷於無休止的部落戰爭之中。

(3) 中共與藏傳佛教（也就是俗稱喇嘛教）之間的基本衝突是：喇嘛教的領袖們以為，在追求宗教與精神上的開拓與滿足的基本前提下，人民應勒緊肚皮以供奉大批宗教執事者（也就是喇嘛們）的舒適生活；但在中共社會主義的觀點下，喇嘛們貴族式的生活，是對人民的一種剝削，這樣的宗教制度只有造成更嚴重的貧困與衝突。

(4) 在中共的民族分類與民族政策下，許多青康藏高原上的少數族群都被歸類為藏族，這個新的藏族族群已遠遠超過達賴喇嘛所認定的「西藏同胞」了。

由於上述的種種因素，所以王先生在文章的最後作如此結言：

但是「藏獨」像許多訴諸民族主義的分離運動一樣，它本身只是許多社會經濟挫折、宗教文化挫折的反射。這樣的獨立運動，不是中共經濟援助與軍事鎮壓所能制止，其所反映的問題也不是達賴回來便能解決。中藏如何兼顧歷史與現實，兼顧物質生活與宗教信仰的原則下，共同協商相處之道，是雙方政治宗教領袖與知識份子的責任與考驗。

王先生雖未明言所說的共同協商相處之道，但是我相信他心中已有所指，那就是在合情合理的政治體制下的族群和諧共生關係。青康藏的藏緬系族群應該大致都能意識到，在與中國兩千年的歷史情結下，在經濟相依賴的境遇下，在族群階層生態體系下，以至於在現實的政教關係情況下，他們要獨立於中國之外，不僅是不容易的事，而且是有損於雙方利益的方案。但若要合在一起，那麼應合在甚麼樣的政治體制下，這才是最關鍵的問題；要讓族群之間和諧共存，共同合作經營一種共生經濟體系，就必須有適宜的政治權力分配制度，至少使族群之間可以免去直接的政治權力分配爭鬥。香港在過去的殖民制度下，族群之間確可免去權力之爭，所以才能維持族群之間的共生；可是殖民制度已是過時的東西，不能再用於現代。在現代的環境下，應該只有在開放的民主體制，在聯邦、邦聯，甚或國協的種種可能形式中尋求維持族群和諧共生之道。

在大陸族群政策體制下，並不只有西藏或藏族的問題，其中較嚴重的尚有新疆的維吾爾、哈薩克、烏孜別克等族的問題，在內蒙有蒙古各盟旗的問題，在延邊有朝鮮族的問題，他們都同樣地徘徊於民族主義意識下的分，以及歷史淵源經濟生態互補、族群關係相依賴的合之矛盾情懷中。就像前面所論說的，只有在一個健全合理的政治體制下，才能真正化解族群的政治利益衝突，營造族群和諧共生的景象。

再說台灣的族群關係，原本並不如西藏與新疆那樣複雜，但卻因政治的因素而日趨緊張。台灣的少數民族是指南島語系的高山族，人口只有三十六、七萬人，佔台灣總人口不及百分之二。其他族群都屬漢族的各種不同方言群，包括閩南人、客家人以及戰後移居的所謂外省人。非漢族的南島民族因為人數少，所以構成的族群問題並不嚴重，而漢族中的本省與外省族群關係原本經50年的相處與通婚，已不太有鮮明的族群界限。但是最近幾年來，卻因兩岸關係的緊張而出現矛盾；此外，台獨聲勢高漲，也助長了族群關係的惡化。因此，台灣的族群關係也並非純粹是台灣內部的問題，實際上亦是兩岸關係挫折的反射。換而言之，同樣也是徘徊於民族認同與否的分，以及歷史文化淵源、經濟共生互補的合之情結中。在這種情況下，香港的實例具有雙層次的示範作用，不僅如前文所述在開放民主政治制度下可提供族群和諧共生的範例，而且在回歸之後將形成兩岸關係發展的參考架構，提供大陸與台灣為政者與一般民眾冷靜思考的實例。但是，這樣的範例是否能真正產生作用，那就視乎我們的政治人物怎樣發揮他們的智慧與誠意了。

李亦園 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台灣)清華大學教授